

# 农业合作化视域下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sup>\*</sup>

邹华斌,刘小莉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 毛泽东; 统购统销; 合作化; 国家与农民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2)03-0006-04

##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sup>[1]</sup>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周恩来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sup>[2]839</sup>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统购统销的政策。<sup>①</sup>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

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sup>[3]242-243</sup>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毛泽东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毛泽东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的参与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sup>[2]846</sup>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sup>[6]297</sup>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

<sup>\*</sup>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邹华斌(1964-),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在读博士,硕士生导师;

刘小莉(1965-),女,湖南宁乡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本与保障——新中国60年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编号:09BDJ002)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11CJ250)阶段性成果。

①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等著作对此过程的述说。

同志的报告”，<sup>[6]295</sup>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sup>[6]297</sup>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毛泽东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毛泽东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sup>[2]681-682</sup>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毛泽东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毛泽东了。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毛泽东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 二、1953 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 1953 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sup>①</sup>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 年，全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25.7%。到 195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3278 亿斤，又比 1951 年增长了 10.6%，比 1949 年增长了 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 1936 年的 3000 亿斤相比，增长了 9.3%。”<sup>[3]2</sup>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 1952 年至 1953 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土改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 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 11 月 7 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提到‘过去山

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sup>[3]265-266</sup>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sup>[5]6-7</sup>

对于 1953 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土改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 年的粮食上市量为 28.2%，1952 年则下降到了 25.7%。<sup>[4]68</sup>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 1952 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sup>[4]69-70</sup>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 15%，有的地区高出 30%。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 10-20%。”<sup>[4]70</sup>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sup>[7]203</sup>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购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 1953 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妨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① 罗平汉的《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以及诸多论文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

### 三、合作化是毛泽东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sup>[8]5</sup>,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土改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

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sup>[9]693</sup>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毛泽东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sup>[10]931</sup>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sup>[11]1477</sup>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土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sup>[12]354</sup>意见。毛泽东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sup>[12]511</sup>

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毛泽东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土改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sup>[13]662</sup>“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sup>[13]720</sup>这就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sup>[14]359</sup>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sup>[6]295</sup>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sup>[13]561</sup>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惩处。”<sup>[13]566</sup>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sup>①</sup>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

<sup>[15]</sup>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毛泽东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毛泽东这种思路<sup>②</sup>,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王丹莉. 统购统销研究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4] 赵发生.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5] 罗平汉. 票证年代: 统购统销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 [6]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M]. 第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7] 陈云. 陈云文选(1949-195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8]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9]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J]. 马恩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4]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15] 卢锋.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与非市场体制的建立[J]. 教学与研究, 1989(3).

责任编辑: 熊先兰  
(下转第127面)

① 实际上, 农民所需要的这四种用途的粮食, 国家所规定的数量是相当低水平的, 有时甚至低于维持再生产需要。

② 1957年1月27日, 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 “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这句话尽管是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几年之后毛泽东才讲的, 但应该说它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

为例[J]. 经济地理 2005 25(4) .

tp: //www. ssly. gov. cn/News/show. asp? id = 320.

[7]杨国良. 旅游流空间扩散[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熊先兰

[8]王海泉. 毛家系列土特产首次亮相旅游商品博览会[OB/EL]. ht-

## Optimization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oshan Based on Diffusion of Tourist Flow

FANG Shi - min ZHAO Jin - jin

( Tourism Management Institute ,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 Hunan 411105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Shaoshan ,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of unreasonable spatial structure in scenic zone , which severely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Shaoshan. Tourist flows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scenic zones are closely linked. Zipf' s law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scenic zone' s tourist flow. The spatial flow of tourist flows in Shaosha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over - concentration , which bring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cenic zones in Shaoshan and the low whole economic. The core scenic zone' s polarization effect is obvious and radiation effect to be weak and so on. Therefore , we can take the measure from tourism node , travel channel , tourist flows , tourism network and tourism system to optimize spatial structure of scenic zone in Shaoshan.

**Keywords:**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tourist flow; diffusion; optimization; Shaoshan



( 上接第 9 面)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Policy in View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ZOU Hua - bin , LIU Xiao - li

(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 Hunan 411105 , China)

**Abstract:**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policy is considered as the policy which is most worthy of atten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far - reaching economic policy. It was mainly put forward by Chen Yun. However it is highly endorsed and supported by Mao Zedong. An important reason of the support by Mao Zedong was the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policy coincided with Mao Zedong thought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farmers .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was the food acquisition crisis between 1952 and 1953 . This crisis was hidden behi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rmers. However , the cooperation which guide the farmer to take the socialist road was the basic train of thought that that eliminate the tension.

**Keywords:** Mao Zedong;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policy; cooperation; country and peasants